

江西南丰傩舞的农耕文化特征

江西教育学院音乐系 刘永红

广东省博罗县石湾中学 朱江

文化是当地人背后由人类学家阅读的文本,它是一个象征体系,通过它我们可以揭示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符号学家苏珊·朗格把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符号现象区分为推论性符号与表象性符号两大体系,而这两大体系正表征了人类所有的精神生活与心灵经验。苏珊·朗格认为,在人类符号中可以归属于表象性符号体系的有仪式、巫术、神话、宗教和艺术等。“仪式是严肃思想的最原始的反映,它是人们对于生命的想象力与洞察力缓慢的积淀。这即为什么它是那样地深沉和神圣。”⁽¹⁾傩是上古时期原始宗教的产物,傩[nuó]舞,又叫“大傩”、“跳傩”,俗称“鬼戏”或“跳鬼脸”,是傩仪中的舞蹈部分。原是古代祭祀性的原始舞蹈,渊源于上古氏族社会中的图腾信仰,舞者头戴形象狰狞的面具,扮成传说中的“方相氏”,一手持戈、一手持盾,边舞边“傩、傩……”地呼喊,奔向各角落,搜寻不祥之物,以驱除疫鬼,祈求一年平安,时间一般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至元宵后几天结束(少数傩班在二月间结束)。傩事活动中不同地区不同村庄的傩舞其傩仪、搜傩、行傩、跳傩各不相同,傩仪是傩的基本形态,现存傩舞主要分布在江西、安徽、贵州、广西、山东、河南、陕西、湖北、福建、云南、广东等地。我国是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国,素称发达的传统农业构成了中华文明史的基本色调,农业经济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农耕文化实质上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是指传统农业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典章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的总和。是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其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

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生命感觉和经验的传达方式,语言符号赋予我们周围世界以形式及其色彩。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认为,人类建构真实的世界是通过他们对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特别选择。运动人体作为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沉积了历史文化的生态烙印,具有语言特性的身体语言——舞蹈语言成形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以特定的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特定民族生命生存状态。傩舞是农民的舞蹈,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农耕文化在傩舞的发展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刘昭注《后汉书》:“傩所以扶阳抑阴也。”但春时行傩,是为了“助是祈福为农始”,可见汉代乡傩已兼有祈年的内容,反映出乡傩与农耕文化的密切关系。逐疫与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愿望结合,衍化出各地异彩纷呈的仪式性民俗活动。傩舞的社会组织形式是附着于农耕文化特点之一的血缘性基础上的宗族组织;其次,傩舞不仅仅是个人爱好,也是村庄或地域共同的爱好,所以又可以称为生命共同体的精神文化,它具有农耕文化全民性的特点,同时农耕文化的封闭性,季节性也是影响南丰傩舞的重要因素。

以下从血缘性、民众性、封闭性,季节性论述江西南丰傩舞的农耕文化特征。

一. 血缘性

传统村庄是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有较稳定的地域界线,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共同体,传统乡村制度根系于宗族组织,宗族组织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最小单位的家族群聚组织,通常在一个村落聚集着同一祖宗的家庭少则几家、几十家,多则上百,并依靠辈分、资历和财产而形成族尊,乡、地主和普通成员等不同身份。

乡傩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参与者都是农民,仅南丰就有3000多农民艺人,大多以自然村组合,按各村情况组成族傩班、村社班、私家班。弟子不限,既有5人一班,也有24人一班,最多36人一班,跳傩的均为农民,称为“弟子”,大家和睦相处,平等相待。

南丰傩班管理模式上看,南丰傩班管理模式有家族傩、村社傩、私家傩(古代丐傩性质)三种。其组织结构是根植于乡村的宗族组织,傩班的建立发展与宗族的兴盛,宗族势力的兴衰密切相关。为首者或按资升迁,或众人推选,或抓阄确定,有大伯、正印、头首、坐案、老座、傩长等称呼。家族傩班属一个姓氏的家族所有,由族姓弟子或依附于族姓的杂姓弟子组成,族姓尊长负责管理,家族提供经济资助,有的仅仅只为族姓的人家跳傩驱疫,以增强家族凝聚力。有的也为周围村庄人家跳傩驱疫,以联络和调节村社关系,其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族姓管理,杂姓表演,典型是三溪乡石邮村吴氏族傩,二是家族管理族人参与,三是分房管理,合房活动。村社傩模式最多,傩班属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的全体村民或部分所有。属全体村民的傩班,或分班管理或家人管理或集体负责,弟子或固定或轮流或挑选,村众提供经济资助。属部分村民入股的傩班,或由专人管理,或轮流主事,弟子或按股参与,或相对固定经费平均分摊。

南丰傩班管理方法因地制宜,有族姓世袭、轮流负责、共同参与等多种形式,资金自筹,收入平分。南丰傩艺人创造的管理模式和传承方法,体现了农民的非凡智慧。

先秦古傩有“驱邪逐疫”和“祈求丰收”两个文化主题,在历史发展中,各地傩舞的文化主题内容都有所扩大,总的来说有“驱邪逐疫”、“祈求丰收”和“祈福纳吉”三种基本类型。南丰傩舞节目除仪式舞外,大多是娱神娱人舞蹈,这些舞蹈的表现内容与人们的劳动生产、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开山》、《雷公》、《纸钱》对应着驱邪逐疫为主题;《和合》对应祈求丰收的主题;南丰各傩班必跳的节目《傩公傩婆》,也象征着人丁兴旺,生生不息,在以家族血缘维系的村落里,子孙满堂是家族兴旺的根本。

二.民众性

傩舞作为民间宗教文化,它体现的是群众的集体性参与状况:傩作为其宗教体现了群众审美意识的外化。群众参与是创造群众文化的根本,傩舞在南丰地区的普及率是相当高的,它的舞体是其整个播布区人口男性的绝大多数,参与者则是全村民众。据1995年调查显示,江西全省至今仍有25个县(市)有傩事活动,保留的傩舞傩戏节目247个。据曾志巩先生专著《江西南丰傩文化》2003年最新统计:“从清代后期至二十世纪末,南丰有过一百八十多个傩班,现仍有一百一十班。”“流传一百一十多个傩舞节目和一百八十多种二千三百多枚面具。”

在整个傩事活动中,傩仪活动不只是个体活动,而是整个村庄(如傩班)特定群体的共同活动,在仪式中,没有旁观者,仪式使所有被动的接受者都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在仪式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全身心的参与。虽然跳傩的人员仅为男性,跳傩的也不是全体农民,但作为当地农村民俗的一种生活,整个社会都是参与进来的,每年正月,傩班在村子里各家各户跳傩、搜傩时,全村不论男女老幼都会参与奉拜迎神观看是毫无疑问的,跳傩时百姓聚集观看、大人小孩参与到傩舞表演当中,如《判官醉酒》中,钟馗手拿酒杯倒酒给围观的观众,小孩围着钟馗嬉闹着要喝酒的互动就需要民众参与。另外,各傩神殿中都有功德箱,从正月初一至十六无论何处信士过往都可来傩神殿烧香许愿还愿。如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的正月十六晚的收傩——圆傩仪式,远近村落的村民们如赶庙会,蜂拥而至,小小的傩神庙被挤得水泄不通,庙内红烛高照、烟雾缭绕,庙外人潮涌动,同时傩神庙附近,还聚集一些傩贩们的糖果,小吃,夜宵,构成一幅完整的农村文化生活画卷。这种情形在城市中却很少见,再精彩的舞蹈表演也仅限于一部分专业或舞蹈爱好者,很少会波及全体社会成员,而傩事活动却渗透到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娶妻生子,盖房,丧葬,岁时节令,都有许多傩事活动参与,傩舞为农村提供精神食粮和社会服务,傩舞的这些特点与农耕生活相对应,即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于是傩成为乡村社会和现代农民的精神家园,傩坛也成为了农民获及精神营养的场所,傩坛赋予了人们近期的期望或远方的梦想,也寄托着普通劳苦大众对未来的希望,傩既是农民精神的避难所,也是宣泄情感的娱乐场,农民在向傩坛神祇许愿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傩神”对自己的约束,傩坛,在“祝”的过程中,也不失

时机地提出一定的道德标准以及实现愿望的前提条件,这样,农民自觉地进入一种精神的规范中。傩祭,规范了乡村的生活秩序,这种精神控制有文化的规范了农民的道德,维护了农业社会的稳定。

三. 封闭性

农耕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土地是农耕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聚族而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日子,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对土地的依恋情愫尤为强烈,人们的活动半径极为狭小,足不出户,一辈子就可以只生活在熟人圈子里,与外界的信息交换极为有限,人们对自己生活圈外的事漠不关心。在通信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农村变化缓慢,同时生活也是单调的,这种相对封闭性社会由于较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无形中保持了文化发展的相对稳定——较少变异,有利于其本土艺术纯粹性的保留。虽然傩舞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戏曲文化的影响,其结果是丰富了傩舞的内容和艺术形式,而并未对傩文化产生颠覆性影响。

傩没有什么文字文本,乡村中大型的傩祭活动:下殿——起傩——跳傩——行傩——圆傩——安座秩序都有一个基本固定的模式,这一模式的程序,大多留存在这些傩班大伯的记忆中,乡村中农民文化的传播完全处于一种口传心授的状态。南丰乡傩的传承方式基本遵循师徒带徒,言传身教,许多傩班不准艺人教傩,一般不外传,尤其家族傩,从不外传或由家族内部传承,也有村民跟班学傩。也正是这种封闭性使得傩舞的古朴原始得以保存,“符号正因为是连续的,所以总是处在变化的状态中。在整个变化中,总是旧有材料保持占优势;对过去不忠实只是相对的,所以变化的原则是建立在连续性原则的基础上的。”⁽²⁾,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由于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利于傩舞文化基因的保存。

四. 季节性

傩事活动时间、活动内容一般都是围绕农耕生产节律来设置的,和年节、民俗有关。农民文化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十分广阔,但又有其自身的基本规律,它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与农业生产季节相吻合的“春祈秋报”的祭祀仪式,一是灾难来临之际(如水灾、旱灾、病疾、死亡等)的祭祷,一是为意愿,即求子、祝寿、建房、经商等活动前后的许愿和还愿仪式。

处于农耕生产方式下的农民与自然环境的联系十分密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时间观念是按生产的节律来进行的,农民把生产的丰收、人丁的兴旺都寄托在神的赐予上,请神词、傩仪赞词等处处包含了风调雨顺、六畜繁盛、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等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内容。清《建昌府志》记载:迎春行耕籍礼后,“复有竹马、大傩、和合、狮子之戏,衣彩衣,戴面具而舞。”建昌府所辖的南丰至今留存上述各类傩舞,而且首跳的“竹马”舞都是一足跳跃,有古代祈雨之舞——商羊舞“屈其一足起舞”的特征。《獭捉鲤鱼精》是根据《礼记·月令》春天物候“獭祭鱼”编创的傩舞,艺人将鲤鱼精面具画满麻点,强调它是雌性,表达了乡民春天不伤母畜的环保意识。南丰傩的驱鬼逐疫、求子祈丰的仪式后来又扩展到祈福、纳吉、求财、兴旺等多种内容。如神词赞诗中的“一愿家家庆吉,二愿夫妇均安,三愿田禾大熟,四愿猪牛兴旺,五愿五谷丰登,六愿大众千秋”;“求嗣者,早生贵子”;“读书者,聪明智慧,求功名早登金榜;农耕者,一籽落泥,万籽收成;做技艺者,上家相请,下家相迎;做生意者,一钱为本,万钱为利”,等等。

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曲六乙和江西傩戏学家钱菲先生合著的第一部《中国傩文化通论》中说:“傩是多元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艺术文化的融合体,是一个在时空上跨时代、跨社会、跨民族、跨国界的庞杂而神秘的文化复合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它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宠儿。”正是因为这样,傩舞中的文化意蕴是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研究的,她的农耕文化特质已初现端倪,而她的人类学意义、心理学价值等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发掘,我们相信傩舞的价值已远远超乎其本身的意义。

参考书目:

- 1.《东方傩文化概论》[M],曲六乙、钱菲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 2.《中国傩文化》[M]王兆乾 吕光群 编著,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3.《中国巫傩史》[M],林河著,花城出版社,2001 年版。
- 4.《巫傩之祭——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M]孙文辉著,岳麓书社 2006 年版。
- 5.《江西省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的跳傩》[M],余大喜、刘之凡著台湾民俗曲艺丛书,1996 年版。
- 6.《中国傩神谱》[M],余大喜主编,广西民俗出版社,2000 年版。
- 7.《江西南丰傩文化》[M],曾志巩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年版。
- 8.《临川傩文化》[M],章军华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 年版。
- 9.《哲学新解》[M]苏珊·朗格,哈佛大学 1957 年英文版。
- 10.《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商务印刷馆 1980 年版。
- 11.《民俗学概论》[M],钟敬文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 12.《文化人类学》[M]美·威廉·A 哈维兰著,瞿铁鹏 张钰译。

注释:

- (1)《哲学新解》[M]苏珊·朗格,哈佛大学 1957 年英文版,第 153 页。
-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商务印刷馆 1980 年版第 112 页。

(上接 140 页)

(9)参见:(1)李安民:《关于文化涵化的若干问题》[J],《中山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第 45-52 页。(2)周云水,魏乐平:《略论滇藏茶马古道上的文化涵化——基于对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的田野调查》[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 1 月第 30 卷第 1 期,第 53-57 页。

(10)本报记者吴亚明:《台湾有个“陕西村”(行走台湾)》[N],《人民日报》2011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第 19 版:台港澳侨。

(11)吴亚明:《台湾有个陕西村》[J],《黄埔》2008 年第 5 期,第 53-54 页。

(12)刘炳路:《中国海外最大的移民团体——陕西村》[J],《乡镇论坛》2004 年第 16 期。

(13)(23)(24)黑克:《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J],《中国摄影家》,2009 年第 1 期,第 72-75 页。

(14)陈琦著:《万里独行,探访中亚陕西村》[N],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 月第 1 版。王蕴如,陈琦:《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南方周末》编:《行走发现》,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335-343 页。

(15)吴亚明:《台湾有个陕西村》[J],《黄埔》2008 年第 5 期,第 53-54 页。

(16)(21)(26)童来运:《台湾有个陕西村》[J],《西安晚报》2010 年 7 月 4 日第 10 版:文化周刊 文化纵横。

(17)本报记者吴亚明:《台湾有个“陕西村”(行走台湾)》[N],《人民日报》2011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第 19 版:台港澳侨。

(18)记者报道:《聚焦中亚“陕西村”》[J],《晚报文萃》2004 年第 9 期,第 12-14 页。

(19)转引自童来运:《台湾有个陕西村》[N],《西安晚报》2010 年 7 月 4 日第 10 版:文化周刊文化纵横。

(20)钟丽红:《台湾的陕西村与长沙街》[J],《老年人》2001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2)陈琦著:《万里独行,探访中亚陕西村》[M]之“咱老回回把教门逮的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5)张洁,樊志民:《本土性:中亚陕西村移民的经济发展模式》[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125-129 页。

(27)参见[1]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J],《思想战线》2004 年第 30 卷第 2 期,第 1-6 页。[2]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在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收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年 1 月版。